跨语言方位词对“左-右”的语义衍化与语义关联模式探究

王梦焰[1,2]，安纪元[1,2]，杨麟儿[1,2]，杨尔弘[1,2]
[1]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北京 100083
[2]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北京 100083
wmybwcx@163.com,jiyuanan.blcu@gmail.com，lineryang@gmail.com
yerhong@blcu.edu.cn

摘要

“左-右”作为普遍空间概念，其语义不断向政治、文化等领域衍化，但对其系统性的跨语言比较仍付阙如。本研究依托词汇类型学框架，选取汉语、英语、挪威语等十种语言，对“左-右”方位词的语义衍化路径与对应关联进行量化分析。在梳理权威词典义项的基础上，利用大语言模型(LLM)生成补充语料，并经母语者审核校对，最终构建跨语言方位词对“左-右”的语义网络。结果表明，“左-右”普遍沿“空间→政治→文化”三阶衍化，对应性语义衍化呈现高度跨语言一致性。该发现为二元对立概念的跨语言普适性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亦丰富了方位词语义演变的类型学证据。本文提出的“智能体设计+上下文学习+多语对齐控制+母语者验证”混合模式为低资源语言语料扩展与语义研究提供了可复制方案。研究成果可服务于跨语言语义探索及基于对立概念的语言教学设计。

关键词： 跨语言语料生成；二元对立；语义衍化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Associative Patterns of the Cross-Linguistic Directional Pair “Left–Right”

Mengyan Wang[1,2], Jiyuan An[1,2], Liner Yang[1,2], Erhong Yang[1,2]
[1]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Print Medi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2]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wmybwcx@163.com,jiyuanan.blcu@gmail.com，lineryang@gmail.com
yerhong@blcu.edu.cn

Abstract

As universal spatial concepts, the semantics of ”left-right” continuously extend into domains such as politics and culture; however, systematic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research remains sparse. Grounded in lexical typology,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semantic extension pathway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of spatial terms ”left-right” across ten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English, and Norwegian. Based on authoritative dictionary entries, supplemental corpora were generated through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followed by rigorous native-speaker validation, ultimately constructing a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 network of ”left-right” spatial ter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universal three-stage semantic extension pattern (”space → politics → culture”) with a high degree of cross-linguistic consistency in semantic correspondences.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科研项目（ZDA145-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3YJCZH264）；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5YCX135）
©2025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696页-第708页，济南，中国，2025年8月11日至14日。

These results provide novel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ross-linguistic universality of binary oppositional concepts and enrich typological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spatial terms. Furthermore, the hybrid methodolo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integrating agent-based design, contextual learning, multilingual alignment control, and native-speaker validation—offers a replicable model for corpus expansion and semantic research in low-resource languages. The findings are applicable to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 exploration and pedagogical design based on oppositional concepts.

Keywords: Cross-linguistic Corpus Generation , Binary opposition , Semantic extension

1 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交流工具，不仅承载着信息的传递，还反映了各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世界上不同语言的存在，既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揭示了语言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不仅体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形式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语义的范畴中。探讨语义的共性与差异，尤其是对具有普遍性和基础性的概念词汇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在普遍经验和思维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左-右”是具有空间指示作用的基础方位词对，同时也在社会、文化、政治等语境中引申出丰富的意义，它作为一种普遍概念，为跨语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例如在汉语中，“左-右”描述身体部位时，有“左手”“右手”，后来演变出“左边”“右边”的方位义，这种空间上的对立引发了在政治立场上“左翼”“右翼”的对立。张博(2009)将语义类聚词所发生的对应性的词义运动称为词义的相应衍化，将词义相应衍化所呈现出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意义联系称为语义关联。在本研究中，“左”从身体部位的左¿空间方位的左¿政治立场的左，这一系列的词义运动称为词义的相应衍化；在词义衍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左”所衍化的意义，“右”都有相对应的意义与之匹配，这种意义联系称为对应性语义关联。那么“左-右”的语义衍化是否在其它语言中存在共性？这种在衍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对应性语义联系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本研究从跨语言的视角出发，借用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概念，通过对比汉语、英语、挪威语、意大利语、印地语、越南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与孟加拉语十种语言中“左-右”的语义，深入探讨其在政治倾向、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社会礼仪及情感评价等领域的多重语义扩展，从而分析跨语言方位词对“左-右”的语义衍化与语义关联。

2 研究背景

2.1 理论框架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指出，人类思维的本质体现为二元对立的结构。这种二元对立不仅表现在认知中的两极组织方式，也广泛存在于语言中的评价极性，这种普遍的认知模式通过语言形式表现为明确的二元对立表达(Paradis, 2016)。Carita Paradis(2016)基于语言与认知的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一种跨语言反义词研究的定名学方法，假设语言中存在具有强烈对立关系的语义词对，这些词对可沿着不同的语义维度产生出其他反义词对，从而构建类型学反义词语义地图。将此理论借鉴到本研究中，“左-右”因其固有的空间对立特征，成为一种典型且基础的反义词对，其语义衍化过程中呈现稳定且对应的语义关系。

Lehrer等(2012)将词汇类型学定义为“研究各种语言里如何将语义材料包装成词的特别方式”。旨在通过比较各语言语义材料方面的异同，归纳词义演变的范围及其所受的限制，并通过这些限制的普遍性揭示看似杂乱无章的词义表象背后的系统性特征。Song(2010)主张，词汇类型学的研究有定名学、符意学、词汇和语法互动三个研究视角，本研究主要从符意学的视角考察方位词对“左-右”的语义衍化和语义关联。

词汇类型学家认为，词义的比较不需要严格界定跨语言词义的一致性，只要从一个普遍概念入手且各语言词化的形式可译，就有比较的可能。“共词化”就是用一个词位或构式表达一组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意义/功能群，广泛应用于跨语言的对比研究中(Viberg, 2004)。当且仅当一种语言能将两种功能不同的意义与相同的词形联系起来时，就可以说它能将这两种意义共词化，通过共词化我们可以看到“左”和“右”在不同语言中的多义性。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Franois(2008)主张将语义地图研究模式应用于词汇类型学，根据“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把不同语言中相类似的语法范畴的分布模式,投射到概念空间中去,这就可以获得一张特定语言的语义地图。吴福祥(2011)认为语义图模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揭示人类语言多功能模式的殊相（变异模式）和共相（普遍特征），特别是不同的多功能模式背后的跨语言规律性。语义图模式作为一种描写的工具，为跨语言语义的研究建构了可视化的直观图示。例如，“左”和“右”在空间方位上的语义可以通过地图直观地显示出来，而它们的其他抽象意义（如“左翼”与“右翼”）也可以被映射到相应的区域。

2.2 相关研究

跨语言词汇类型学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成军, 2019)(胡平and 吴福祥, 2023)(吴淑琼, 2019)(应学凤and 陈昌来, 2024)。如欧洲语言学项目对身体词语、空间词语、切割破坏动词、放置和拿走动词等不同范畴的研究，莫斯科词汇类型学研究小组对水中动词、旋转动词、疼痛词语、属性词语等范畴的研究等(付冬冬and 于洋, 2023)。这些研究为词汇类型学的发展塑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汉语学界也十分重视词汇类型学研究，易焱等(2013)回顾发现，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动词词汇，如运动事件、致使事件、感官动词等类别，并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相遇”类动词进行了研究。后来的汉语词汇范畴跨语言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动词类别上，近年来，“追逐”“穿戴”类动词(张定, 2017)、“吃”“喝”类动词(贾燕子and 吴福祥, 2017)、动词“坐”(韩畅and 荣晶, 2019)、“躺卧”动词(吴瑞东, 2020)以及动词“吹”(付冬冬and 于洋, 2023)的研究陆续开展，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类型学的研究视野。

纵观对词汇类型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种：基于双语词典释义的词义对比分析，韩畅等(2019)、付冬冬等(2023)分别利用双语词典的基本释义研究了动词“坐”的多义表现和动词“吹”的共词化模式；基于跨语言数据库的词义研究，其中以List等建立的CLICS 数据库为代表(Rzymski et al., 2020)，许可等(2024)综合了其他语言类型学数据库的经验建设“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对61种语言的基本核心词词义进行了全面比较；基于跨语言词向量对齐的词汇意义比较，胡楠等(2022)通过汉语和日语预训练词向量获得两种语言中的词汇语义表示, 构建了涵盖20 个语义场、897 个词对的概念词表,通过跨语言词向量计算揭示两种语言的语义场异同。

当前跨语言词汇研究多关注于动词、属性词等范畴，对于方位词尤其是“左-右”这样典型的二元对立词对的跨语言研究较少，且数据采集手段仍多局限于传统词典或现有数据库。近年来，大语言模型（LLM）的兴起为跨语言词汇类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Chen等(2024)探讨语言类型学在解决LLM的语言混淆现象中的作用，同时证明了LLM在处理大规模多语言数据方面的强大潜力。

因此，本研究选取汉语基础方位词对“左-右”为研究对象，尝试使用LLM生成跨语言语料，结合母语者审核，提高语料的有效性和研究的可信度。采用共词化与语义地图模式分析方位词对“左-右”在汉语、英语、挪威语、意大利语、印地语、越南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孟加拉语十种语言中的语义表现，并探讨语义衍化过程中二元对立关系的制约作用。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左、右”词汇在十种语言中的语义如何表现？其语义衍生过程是否受二元对立的关系制约?

3 “左、右”语义的数据收集与衍化分析

3.1 词典中方位词“左、右”的跨语言多义表现

本研究聚焦于方位词“左”“右”的语义扩展。首先以汉语和英语为基准，归纳出初始义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挪威语、意大利语、印地语、越南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和孟加拉语的双语词典释义，最终梳理并确立了18种义项，每个义项视为一个语义节点。基线义项来源于《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柯林斯在线词典》等权威双语词典，如表1所示。研究所选十种语言横跨汉藏、印欧、南亚、闪米特等多个语系和结构类型，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观察发现，“右”的语义较“左”更为丰富，“左”和“右”在不同语言中展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功能，从空间方位的描述到抽象意义的扩展，再到政治、文化的隐喻。针对部分语言的低资源特性，为确保语义统计的完整性，本研究使用大模型生成语料，并参考母语者审核结果进行语义补充。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语义	语言	汉语	英语	挪威语	意大利语	印地语	越南语	乌尔都语	阿拉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左	左手	✓	✓	✓	✓	✓	✓	✓	✓	✓	✓
	左边	✓	✓	✓	✓	✓	✓	✓	✓	✓	✓
	错误	✓	✓				✓				
	左撇子	✓	✓								
	相反	✓									
	偏	✓									
	左翼	✓	✓	✓	✓	✓		✓	✓	✓	
	顺序	✓	✓	✓	✓		✓	✓	✓	✓	
右	右手	✓	✓	✓	✓	✓	✓	✓	✓	✓	✓
	右边	✓	✓	✓	✓	✓	✓	✓	✓	✓	✓
	正确		✓				✓				
	右翼	✓	✓	✓	✓	✓		✓	✓	✓	
	顺序	✓	✓	✓	✓	✓	✓	✓	✓	✓	
	尊贵	✓									
	正常		✓								
	潮流		✓								
	完全		✓								
	立刻		✓								
	权力		✓								

表 1: “左-右”共词化语义清单

3.2 大模型语料生成与母语者审核

近年来，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作为基于海量语料库训练的生成式模型，大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能够自动化生成高质量的语言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数据收集方式，这种生成能力使得大语言模型在跨语言语料的构建中具有独特的潜力和应用价值(Brown et al., 2020)。相比于依赖人工或传统语料库检索，大模型的生成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覆盖多种语言和不同的语境，极大地节省了研究者的工作量。本研究致力于探索在无现成语料的前提下，利用大语言模型构造跨语义场景、多语言的高质量语料，并据此探索不同语言的语义衍化路径与语义关联模式。

本研究采用GPT-4O模型，设计了一个多智能体系统，用于不同语言语料的生成与校对。该系统包含两个关键智能体：语义生成智能体和语义校对智能体。针对每种语言，我们都设计了专门的提示（Prompt），使得每个智能体能够在特定语境下高效执行任务。以下以印地语为例，详细描述我们系统的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

语义生成智能体：该智能体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输入的提示生成目标语言的语义数据。例如，对于“左”字的多义性，给出总结汉语词典中“左”的不同义项，如方位词、错误、左翼等。基于此，语义生成智能体根据设计的提示生成印地语中“左”字的义项及对应的例句。为了确保生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设计了多种提示策略，经过实验比较，最终选定了效果最佳的提示形式，以提高生成的质量和一致性。

语义校对智能体：生成后的语料需要经过校对智能体的审核。校对智能体的任务是根据其语言学知识对生成内容进行验证，删除不恰当的义项，纠正错误的用法，并补充可能遗漏的义项，尽可确证保生成语料的自然性，以便人工校对。

校对工作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由具备相应语言能力的母语者审核生成语料，这些母语者是所在国家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且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HSK4-5级），并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能够进行跨语言校对工作。审核内容包括：判断所给语料是否准确、是否符合本国的语言习惯、对于“左-右”在本国的实际使用语义是否有遗漏，若有遗漏则对其进行补充。

针对各语言中的同类语义现象，我们采用同一词形标记，将不同语言中的相同语义统一划

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696页-第708页，济南，中国，2025年8月11日至14日。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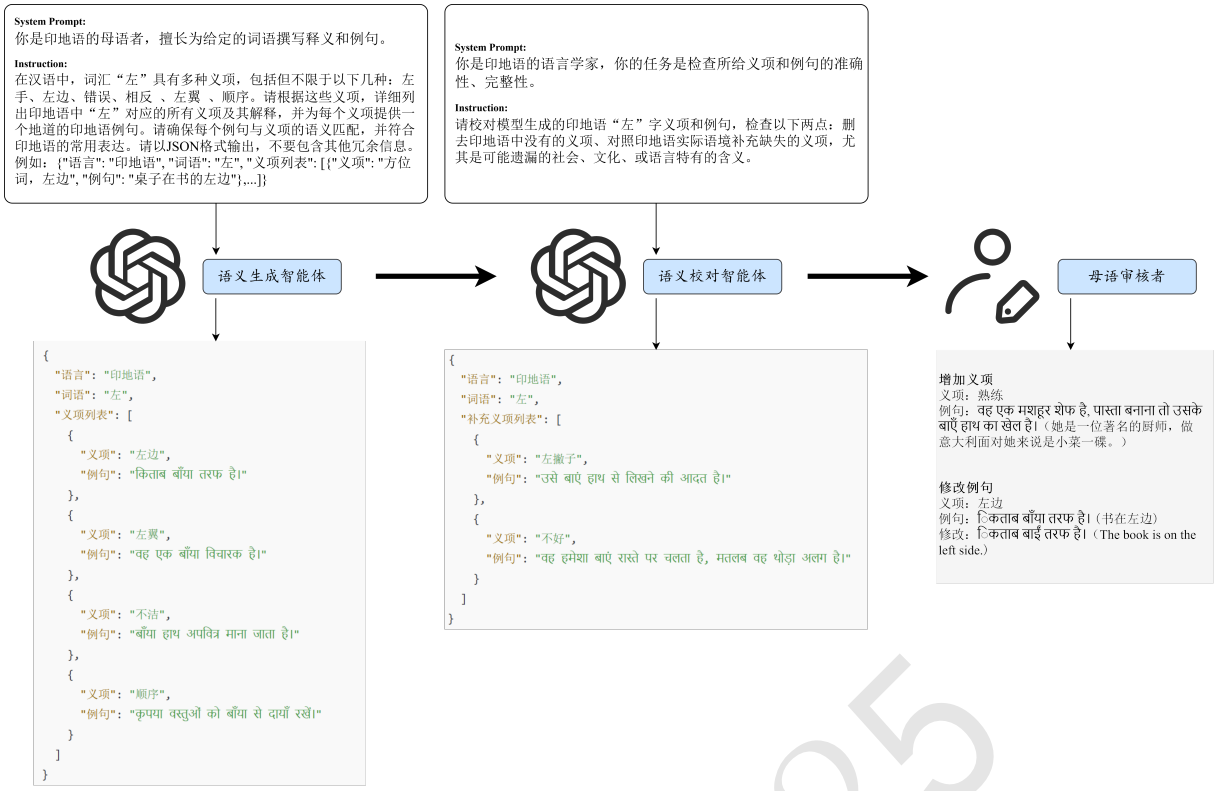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语料获取流程

入已定义的语义类别。类似“右利手、手巧、熟练”等表达相同语义，但具有多种表达方式的，兼顾其语义共性和与其它意义之间的区别，采用“熟练”义。

对于低资源语言，生成和校对过程尤为关键。本研究提出的“智能体设计+上下文学习+多语对齐控制+母语者验证”混合模式，具备良好的迁移性并兼顾成本、效率、语料可靠性，在当前以“人机协作”进行语义知识构建的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的探索价值。

母语者的参与使得语料的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的语法结构、语义表达和文化差异时，能够确保翻译或生成的文本符合目标语言的使用规范和语境要求。经母语者审核修订过后，最终获取包含十种语言共110份语料。其中部分语言增加了词典中未包含的语义，如表2所示。

其中标红的部分为母语者审核后新增的语义。经统计，共确定了32种“左”和“右”的语义，其中14种语义是某个语言独有的，剩余18种满足“重叠多义性”，这表明其概念的关联并非偶然，是具有跨语言共性的。

3.3 “左、右”的语义衍化路径与认知机制

词汇类型学关注不同语言如何将一个词汇形式对应到多个语义领域，同时也探讨语义间的潜在联系与跨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我们可以通过“共词化-语义地图”模型分析方位词“左”和“右”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衍化。

共词化分为严式共词化和宽式共词化两种，当意义严格按照同一词形编码时，为严式共词化，而宽式共词化则包含了同源词、派生词、或复合词体现的意义。例如英语中“右边”和“正确”都用“right”表示，那么“正确”和“右边”就是严式共词化，而英语中表示“笨拙”用“two left hands”，用“left”表示“左边”，那么这两个意义就是宽式共词化。通过不同语言的中的共词化分析，可以归纳跨语言的多义清单。如表2中，汉语和英语“左”的共词化，除了“笨拙”“剩余”两个意义之外，都具有语义重叠。

共词化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词在各语言之间的意义分布情况，语义地图则便于考察微观的语义关联。语义图要求特定的语言形式的多个功能必须在语义图上相互毗邻。概念空间是构建语义图的基础，它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建立起来的普遍语义空间(吴福祥, 2011)。根据语义地图构建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语义	语言	汉语	英语	挪威语	意大利语	印地语	越南语	乌尔都语	阿拉伯语	保加利亚语	孟加拉语
左	左手	✓	✓	✓	✓	✓	✓	✓	✓	✓	✓
	左边	✓	✓	✓	✓	✓	✓	✓	✓	✓	✓
	错误	✓	✓				✓				
	左撇子	✓	✓			+				+	
	相反	✓									
	左翼	✓	✓	✓	✓	✓		✓	✓	✓	
	顺序	✓	✓	✓	✓		✓	✓	✓	✓	
	性取向									+	
	不纯洁					+				+	
	笨拙		+							+	
	偏,怪诞	✓	+								
	剩余		+								
	险恶				+						
	负面的					+					
	不好						+	+	+		+
	熟练					+					
右	右手	✓	✓	✓	✓	✓	✓	✓	✓	✓	✓
	右边	✓	✓	✓	✓	✓	✓	✓	✓	✓	✓
	正确		✓				✓				
	纯洁					+		+		+	
	右翼	✓	✓	✓	✓	✓		✓	✓	✓	
	顺序	✓	✓	✓	✓	✓	✓	✓	✓	✓	
	尊贵	✓									
	发誓								+		
	正常		✓								
	潮流		✓								
	完全		✓								
	立刻		✓								
	权力		✓								
	熟练				+	+					
	该						+				
	好						+	+	+		+

表 2: “左-右”共词化语义补充清单

CCL 2025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的邻接性要求和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我们参照最终共词化语义清单中不同语言的共现频率，与词典中义项的排列方式，设定语义衍化各节点的距离，构建了跨语言“左”“右”的概念空间。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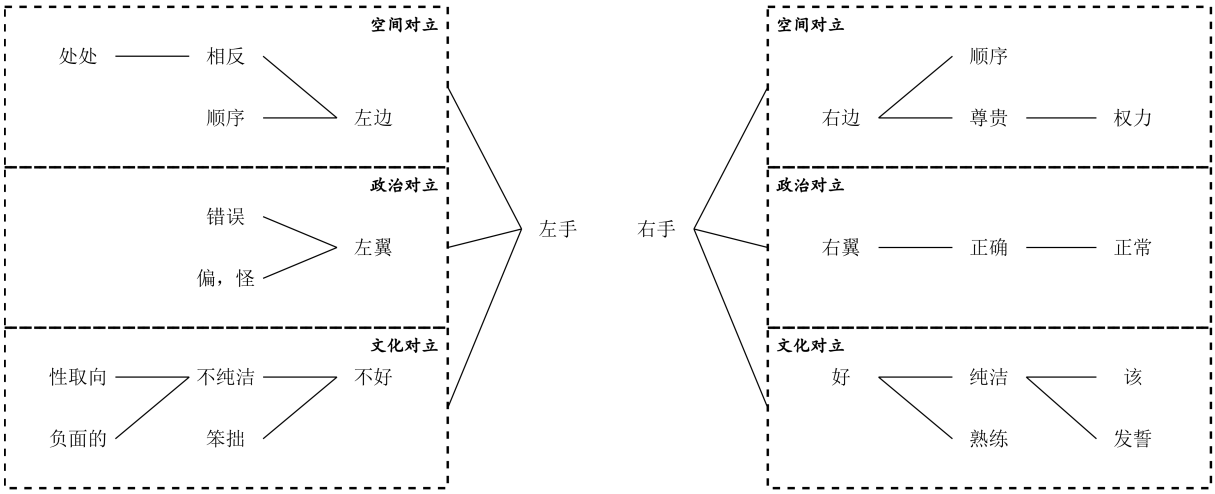

图 2: 跨语言“左”“右”的概念空间

图2显示，不同语言的“左”“右”概念呈现3个语义衍化路径，分析如下：

3.3.1 基于空间对立关系的语义衍化

“左”和“右”最初表示身体部位的对立，是人类身体结构直观认知的体现。随着语言的发展，这一对立关系逐步衍生至空间方位的表达，形成从身体部位到空间位置的语义扩展路径。孟加拉语中如图3所示的例句①、②展示了“左-右”从身体对立向空间定位的转变。这一衍化路径在本文所考察的十种语言中普遍存在。汉语中关于“左、右”表示尊卑的讨论古已有之，《汉语大词典》“右”条:“古代崇右,故以右为上,为贵,为高。空间方位义的“右”受到人类认知机制的影响，逐渐演变出表示社会地位的“尊贵”义。

3.3.2 基于政治对立关系的语义衍化

“左”和“右”在空间方位中的对立进一步被借用来表达政治立场。“左翼”和“右翼”最初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座位安排。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中，支持革命和变革的议员坐在议会的左侧，而支持保持传统秩序、维护王权的议员则坐在右侧。这一物理空间位置上的区分逐渐衍生为政治立场的象征。保加利亚语中的例句③、④正体现了这一语义演变。此外，在英语等语言中，“left”和“right”同样演化出“left-wing”（左派）和“right-wing”（右派）等政治用语。除了孟加拉语和越南语，多数受调查语言均采用“左-右”二元对立来表示政治立场。

序号	语言	原文	译文
①	孟加拉语	বইটা টেবিলের বাম পাশে আছে।	书在桌子的左边
②	孟加拉语	দয়া করে সিগন্যালের পরে ডান দিকে ঘুরুন।	请在红绿灯后右转
③	保加利亚语	Той е политик от ляво крило	他是一个左翼政治家
④	保加利亚语	Дяс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те партии обикновено са по-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и	右派党派通常更保守

图 3: “左-右”语句示例(a)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3.3.3 基于文化对立关系的语义衍化

“左”和“右”不仅体现为空间上和政治上的对立，在部分语言文化中，还承载着文化评价的语义色彩。在印度文化中，右手和左手的区分涉及到深厚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惯，印度教中的宗教信仰，强调身体的清洁和纯洁性，许多宗教仪式和祭拜活动都要求使用右手。例如，奉献食物、接受供品、触摸神像或进行祈祷时，信徒会使用右手。左手被用来进行个人卫生处理，如洗手间后清洁等，因它与肮脏、不洁的事务有关，被视为不洁之手。如图4印地语例句⑤所示，这种对身体部位的功能区分直接影响了“左-右”在文化认知中的语义扩展。

同样，越南文化在佛教、儒家和本土信仰的影响下，也存在“右吉左不吉”的观念。如例句⑥，佛教中的“右手举法”是用来表示“吉利”或“祝福”的动作，右手通常与好运、力量、智慧等积极意义相连，而左手则常代表不吉利。这种对“左-右”功能价值的差异化认知，是语义从物理器官向文化象征演化的重要体现。

“左”和“右”的语义也体现为对行为或思想的价值评判。在很多文化中，“右”因其与主用手相关，是人们从事劳务活动的主力，象征力量、正义与规范，从而演化出“正确”“正常”的含义。相反，“左”则常被联想到错误、偏离常规或负面评价。例如保加利亚语中“从左向右点头”表示同意（例句⑦），说明“右”与“正确”密切关联。

英语中“right”既表示“右”，也可表示“正确”，这一双重含义揭示了身体方位与价值判断的深层联系。越南语中，“phai”（右）也引申出“正确”，而“trai”（左）则有“错误”之意（例句⑧）。这些例证反映出“左-右”从感知功能逐步演化为文化与认知层面的价值取向。

序号	语言	原文	译文
⑤	印地语	भारतीय संस्कृ ित में दाि हना हाथ पिवत्र माना जाता है। बायां हाथ अपिवत्र माना जाता है।	在印度文化中，右手被认为是神圣的，左手被认为是不洁的
⑥	越南语	Tay phải là tay mạnh và thường được coi là may mắn. Trái tay có thể bị coi là không may	右手通常被认为是幸运的，左手代表不吉利
⑦	保加利亚语	Той показа,че е съгласен като поклати глава отляво надясно	Head shaking, on left to right is “Yes”
⑧	越南语	Cậu làm như vậy là “phải” rồi Điều đó là sai “trái	你这样就是正确的，那样是错误的

图 4: “左-右”语句示例(b)

3.3.4 语义衍化的认知机制

韩畅(2019)、付冬冬(2023)研究不同语言动词“坐”“吹”的共词化，认为其共词化语义及衍生路径主要表现为“结构隐喻”。与“坐”共词化语义及其衍生路径类似，左右方位词的语义演化同样体现了Lakoff等(2008)提出的一种核心隐喻机制——结构隐喻。结构隐喻通过源域概念来映射构建目标域概念。例如，“左-右”最初作为指称人体部位的方位词，其概念域位于人类基础经验层次，即“身体—空间”域。然而，伴随语言使用的扩展，“左-右”的语义逐渐投射至“道德评价”、“政治意识形态”等高度抽象的认知域，形成了“身体方位—空间—政治—文化、价值判断”的跨域链条。这种映射过程与“坐”由具体动作到抽象状态、空间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语义扩展路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在本研究所呈现的十种语言中，“右”普遍与“正统、洁净、尊贵”等正面评价关联，“左”则与“错误、阴性、不洁”等负面概念共词化。这种语义映射不仅是一种抽象的隐喻关系，更是一种基于人类身体认知经验的文化编码过程，符合跨语言隐喻范畴等级序列，即“人→物→活动→空间→时间→性质”(韩畅and 荣晶, 2019)。

此外，这一结构隐喻的实现程度在不同语言中还受到文化语境与语用功能的影响。例如，汉语和英语的“左-右”在语义衍化上映射链条完整且系统，不仅涵盖了具体身体方位的概念，也延伸至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判断领域；而越南语虽然在结构上大量借用汉语，但在具体

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696页-第708页，济南，中国，2025年8月11日至14日。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语义映射层面却未完全同步，“左-右”义项的使用更多地集中于具体的空间关系范畴，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抽象隐喻映射。这种差异凸显了语言接触背景下隐喻映射过程之间的不完全对应性。

3.4 不同语言“左-右”的语义关联分析

语义地图能够直观清晰地展现“左”和“右”在不同语言中的多义性表现。本文依据语言的亲缘关系远近，将十种语言划分为三组，并分别绘制其语义地图，以凸显语言类型与语义演化路径之间的关联。印地语、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均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图5所示的语义地图展示了印度-伊朗语族内部的语义扩展路径。观察发现，这些亲缘关系密切的语言在“左”和“右”的语义衍生方面呈现明显的一致性。其中印地语的衍生义项最为丰富，三种语言的方位词都经历了从空间概念向政治和文化对立概念的语义扩展。具体而言，“左”普遍涵盖左手、左边、顺序、左翼、不好等语义，“右”则普遍涵盖右手、右边、右翼、好等语义。英语、挪威语、意大利语和保加利亚语同属印欧语系，分别隶属于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图6展示了这些语族之间的语义衍化情况。分析表明，英语和保加利亚语在空间、政治及文化领域均存在语义扩展，但在文化领域的表征存在明显差异：英语倾向于用“左”表达负面含义，而保加利亚语则倾向于用“右”象征纯洁、正面意义。相对而言，挪威语和意大利语的语义扩展路径主要集中于空间和政治领域，较少涉及文化领域的延伸。汉语（汉藏语系）、越南语（奥斯特罗-亚细亚语系）和阿拉伯语（闪含语系）属于语言类型差异显著的一组。图7呈现了这三种语言的语义地图，其语义扩展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汉语的“左”义项最为丰富且多元化，尤其明显沿政治对立方向进行语义扩展。尽管越南语大量借用汉语的结构和语素，但其语义共词化进程并未与汉语完全同步。阿拉伯语则表现出较强的文化特征，方位词的语义与宗教文化紧密相联。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的亲缘关系及语言类型的差异性显著影响着方位词“左”“右”的语义演化模式与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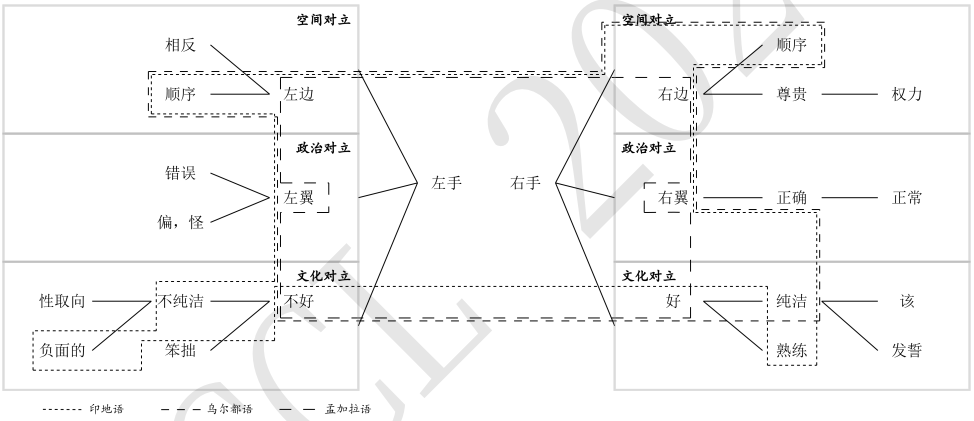

图 5: 印度-伊朗语族内部诸语言“左、右”语义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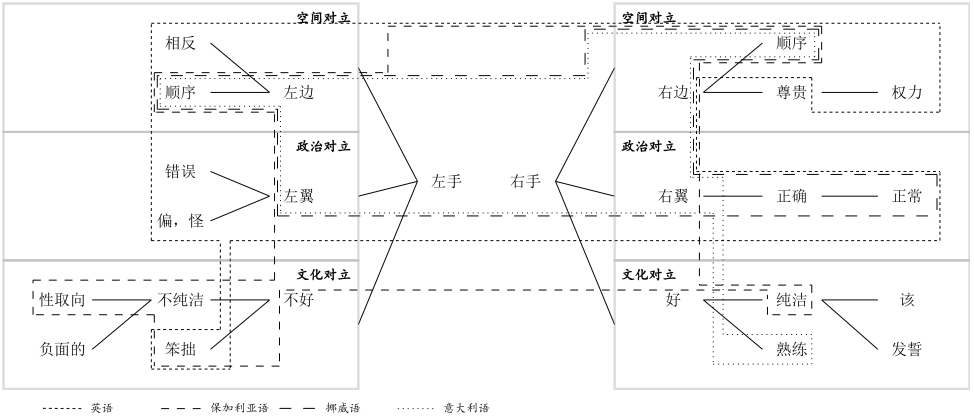

图 6: 印欧语系不同语言“左、右”语义地图

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696页-第708页，济南，中国，2025年8月11日至14日。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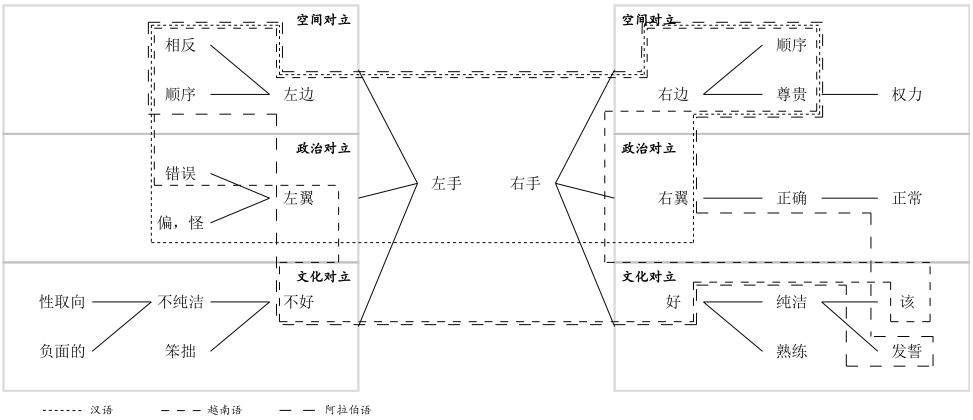

图 7: 汉藏语系-闪含语系-南亚语系“左、右”语义地图

3.4.1 语义关联模式的共性

观察十种语言的语义衍化可知，尽管在具体语言中存在语法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但不同语言中“左”“右”的衍化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十种语言中都以身体部位的“左-右”为出发点，都具有表示“空间方位”“政治立场”“文化内涵”的衍化意义。这表明“左-右”方位词对的衍化不仅仅是单个语义的发展演变，而是受语义关联模式制约。这里所说的语义关联模式，是指在“左-右”这一二元对立关系下，不同语言中语义衍化路径的关联，它们都基本遵循“二元对立”关系的制约，当“左”或“右”某个词衍化出一种语义时，另一个词会在同时期衍化出与之相对的意义。这种对立关系的制约不是绝对的。

3.4.2 语义关联模式的差异

除了前文所述“左-右”在多数语言中呈现出相似的语义演化路径外，也存在一些语言中“左”与“右”词汇在特定文化中所承载的独特意义，这种语义的差异性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之间深层的互动。例如，在汉语中，“右”常与“尊贵”相关，如“上尊下卑、右高左低”反映了传统礼制中的空间等级观，这在多数语言中并不具有相似性。在英语中，“left”除了空间方位，还常用于形容人的笨拙（如”two left feet”）。类似地，保加利亚语中也有使用“左”表示无能的表达方式，如图8例句⑨中的“他是左手人”意指其不擅长某事。这说明“左”在部分语言中被赋予了“笨拙、不灵活”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些语言中“右”并未发展出对应的“聪明”或“灵活”等积极含义。在印地语中，“右”用于表示熟练，而更有趣的是，“左”并非表示“不熟练”，而是表示“更加熟练”，如例句⑩中，“她做意大利面如同左手游戏”，即意指轻而易举。这种语义结构显示出该语言内部对“左-右”关系的独特建构。

此外，在阿拉伯语中，“右”还衍生出“起誓”的意义，如例句所示。这一用法反映了“右”在信仰和文化语境中所具备的庄严性与神圣性。总而言之，各语言中“左-右”语义网络的演化既有共同的人类认知基础，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语义对立项在演化中呈现“局部相似，整体多样”的格局。

4 总结

本研究采用了大语言模型生成跨语言语料，并结合母语者审核，确保语料的准确性与自然性。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不仅扩展了传统词汇学的语料来源，也提高了语料的多样性和可靠性。此外，通过“共词化-语义地图”模型分析，研究清晰地展示了“左-右”方位词在各语言中的语义分布，并构建了跨语言的“左-右”语义地图。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

4.1 “左-右”方位词的语义衍化路径与关联模式分析

不同语言中的方位词对“左、右”普遍延空间-政治-文化三阶衍化。空间对立指从身体部位的“左”和“右”扩展到空间方位的对立，在所有十种语言中，首先通过描述身体部位（如“左手”“右手”）的对立关系，演变为空间方位上的“左边”和“右边”；政治对立指在多种语言中，“左-右”衍化为政治立场的对立，如“左翼”和“右翼”分别代表政治的不同方向，这一语义扩展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源自议会的座位安排，进而成为全球政治对立的象征。文化对立指在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序号	语言	原文	译文
⑨	保加利亚语	Той клони наляво, май е на левия бряг, защото никога не излиза с момичета	He has “two left hands” or “He is lefted man” means he is very incapable man
⑩	印地语	वह एक मशहूर शेफ है, पास्ता बनाना तो उसके बाएँ हाथ का खेल है।	她是一位著名的厨师，做意大利面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⑪	阿拉伯语	علي اليمين	I swear

图 8: “左-右”语句示例(c)

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和越南，“左”与“右”的文化象征意义被赋予深刻的宗教和社会价值。例如，印度教文化中右手象征纯洁与神圣，而左手与不洁和低级事务相联系。

在不同语言中，尽管具体表述不同，“左”和“右”的语义衍化路径一定程度上遵循普遍的二元对立关系，也会存在跨文化的衍化个性。每当“左”扩展出某一意义时，“右”通常会衍生出与之对立或相对的意义。这一规律表明，跨语言的词汇衍化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变，更是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的深刻映射。

4.2 大语言模型+母语者审核方法

方法论层面，本文提出的“大语言模型生成-母语者校验”混合范式有效解决了低资源语言语料瓶颈问题。针对传统词典义项收录不全面、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掺杂幻觉、人工数据标注成本高耗时长的问题，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智能体设计+上下文学习+多语对齐控制+母语者验证”工作流数据获取方法，构成了一种具备跨语言迁移性与可控性的新型语义生成模式。这一模式适用于多数低资源语言语义研究场景，已超出传统语言学方法。

研究表明，词典原有义项为18种，“性取向、熟练（左）、发誓、该”4个义项为母语者审核补充节点，其余10个义项是大语言模型生成语料，经母语者审核后确定。我们在计算语义节点覆盖时，是以全部语言中的语义节点为对象，不区分单个语言中的有无。相较于传统词典分析法，大语言模型新增语义节点覆盖率：10/18约为55.56%；大语言模型+母语审核新增语义节点覆盖率：14/18约为77.78%。该模式为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方案。

5 局限性与未来工作

尽管本研究在语料收集过程中充分借助了大型语言模型（LLMs）的生成能力，并辅以母语者的人工审核，从而在效率与准确性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但其所涵盖的语言范围仍相对有限，

语言	GPT-4o	母语者审核
印地语	किताब बाँया तरफ है。 （书在左边）	किताब बाईं　तरफ है。 （阳性“左”改为阴性“左”）
阿拉伯语	*无此义项*	علي اليمين （增加义项“发誓”）
乌尔都语	وہ بائیں بازو کے سیاستدان ہیں۔ （他是一个左翼政治家）	وہ ایک　بائیں جانب کا سیاست دان ہے۔ （他是一名左翼政治家）
越南语	Ông ấy là một chính trị gia trái. （左翼）	*无此义项*

图 9: GPT-4o生成语料与母语者审核对比

仅聚焦于十种语言。这一设计虽为探讨“左-右”方位词的跨语言语义衍化提供了有价值的比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较视角，但却未能涵盖更广泛的语言类型，研究所揭示的规律和结论可能会受语言范畴、语法结构及文化背景差异的局限，仍需进一步验证。

此外，大语言模型生成的语料虽然涵盖了多种语言的多义性，但仍存在语法错误、语义遗漏、自然性欠缺、虚假语义的局限。例如图9，印地语中，“左”在语法上有阴性、阳性之分，“书”为阴性，模型生成的语料误用了阳性的“左”；模型未给出阿拉伯语“发誓”的义项；乌尔都语生成的“他是一个左翼政治家”表述不自然；越南语给出了“左翼”义项，但实际使用中没有此用法。某些方位词在具体语境中的隐含意义，尤其是在特定历史语境或文化实践中的衍义用法，可能未被充分反映。

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扩大语言范围，涵盖更多具有不同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具有独特语言结构的语言，如土著语言、阿尔泰语系语言和非洲语言等。同时，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语料库访谈等方法，深入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者互动，进一步探讨不同语言中方位词在复杂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多样化表现。

参考文献

Tom Brown, Benjamin Mann, Nick Ryder, Melanie Subbiah, Jared D Kaplan, Prafulla Dhariwal, Arvind Neelakantan, Pranav Shyam, Girish Sastry, Amanda Askell, et al. 2020. 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learner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3:1877–1901.

Yiyi Chen, Qiongxiu Li, Russa Biswas, and Johannes Bjerva. 2024.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easily confused: A quantitative metric, security implications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arXiv preprint arXiv:2410.13237*.

Alexandre François. 2008. Semantic maps and the typology of colexification: Intertwining polysemous networks across languages.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2008.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drienne Lehrer, Eva Feder Kittay, and Richard Lehrer. 2012.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Routledge.

Carita Paradis. 2016. Corpus method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ntonyms across languages.

Christoph Rzymski, Tiago Tresoldi, SimonGreen, Hill, Mei-Shin Wu, Nathanael E. Schweikhard, Mária, Koptjevskaja-Tamm, Volker Gast, Timotheus A. Bodt, Abbie Hantgan, Gereon A. Kaiping, Sophie Chang, Yunfan, Lai, Natalia Morozova, Heini Arjava, Nataliia Hübler, Ezequiel Koile, Steve Pepper, Mariann Proos, Briana, Van Epps, Ingrid Blanco, Carolin Hundt, SergeiMon, akhov, Kristina Pianykh, Sallona Ramesh, Derek Russell, Gray, Robert Forkel, and Johann-Mattis List. 2020. The database of cross-linguistic colexifications, reproducible analysis of cross-linguistic polysemies. *Scientific Data*, 7.

Jae Jung Song.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Åke Viberg. 2004. The lexical typological profile of swedish mental verbs. *Languages in contrast*, 5(1):121–157.

付冬冬and 于洋. 2023. 词汇类型学视野下动词“吹”的共词化分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 (01):99–112.

吴淑琼. 2019. 国外认知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外语教学, 40(03):19–25.

吴瑞东. 2020. “躺卧”动词语义图研究. 语言研究, 40(04):97–109.

吴福祥. 2011. 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 语言研究, 31(01):25–42.

应学凤and 陈昌来. 2024.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四十年. 汉语学习, (01):52–63.

张博. 2009. 汉语词义衍化规律的微观研究及其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 世界汉语教学, 23(03):355–368.

张定. 2017. “穿戴”动词语义图. 当代语言学, 19(04):546–560.

成军. 2019. 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视角转换:从形态、功能到库藏.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5(06):145–153+203–204.

第二十四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696页-第708页，济南，中国，2025年8月11日至14日。

(c) 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易焱and 王克非. 2013. 词汇类型学视角下的英汉语类动词对比研究. 外语教学, 34(01):7–13.

胡平and 吴福祥. 2023. 跨语言同词化数据库与词汇类型学研究. 当代语言学, 25(04):562–576.

胡楠, 张文强, and 胡韧奋. 2022. 基于跨语言对齐词向量的汉日词汇意义比较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02):133–143.

许可and 冉启斌. 2024.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对61种语言数据的分析. 世界汉语教学, 38(01):79–96.

贾燕子and 吴福祥. 2017. 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31(03):361–381.

韩畅and 荣晶. 2019. 动词“坐”的词汇类型学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33(04):504–521.

附录：母语者审核调查问卷示例

Prompt: In your country, in what contexts do the words “बाँया” (left) and “दायाँ” (right) appear? Below is a partial list of possible scenarios I’ve compiled. 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with the following?

1. Check whether the sentences I’ve written are correct and in line with your usage. If they aren’t correct or don’t match your linguistic habits, please correct them or rewrite a sentence (Write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ad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fterward.).
2. Add any other uses of “left” and “right” in your country that I haven’t mentioned (Write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ad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fterward.).

1.किताब **बाँया** तरफ है। (书在左边)
修改：
2.कृपया **दायाँ** मुड़ें। (请向右转)
修改
3.वह एक **बाँया** विचारक है। (他是一个左翼思想家)
修改
4.**दायाँ** पार्टी अधिक पारंपरिक है। (右派党派更为保守)
修改
5.भारतीय संस्कृति में **दायाँ** हाथ पवित्र माना जाता है। (在印度文化中，右手被认为是神圣的)
修改
6.**बाँया** हाथ अपवित्र माना जाता है। (左手被认为是不洁的)
修改
7.कृपया वस्तुओं को **बाँया** से **दायाँ** रखें। (请将物品从左到右排列)
修改
8.लिस्ट को **दायाँ** से **बाँया** ترتیب दिया गया है। (这个列表是从右到左排列的)
修改
9. वह अपने काम में दाहिने हाथ जैसा कुशल है।（他在工作中像右手一样熟练）
修改
10. उसे बाएं हाथ से लिखने की आदत है।（他有用左手写字的习惯）
修改
11. वह हमेशा बाएं रास्ते पर चलता है, मतलब वह थोड़ा अलग है।（他总是走左边的路，也就是说他有点不同寻常。）
修改

What are some other meanings of the words "left" and "right" in your country that you can think of? Please provide examples.

CCL 2025

（c）20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